

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

——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^{*1}

陆帅

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）

【内容提要】：南京江宁出土的刘宋罗健夫妇、罗道训三方买地券，为研究六朝建康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通过释读、考证券文可知，罗健与罗道训为父子关系，其原为堂邑郡高山县人，后南渡过江，著籍南徐州南彭城郡。东晋末年，罗氏父子追随刘裕代晋建宋，活跃于刘宋政治中，由此迁居建康周边，买地营葬。罗氏家族的活动是晋宋之际建康周边社会变动的缩影。

【关键词】：买地券；堂邑罗氏；建康；南徐州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871.4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：A

建康城研究是六朝史领域的基本课题。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，海内外学界不断加以关注，成果丰硕，尤其在城市空间布局的复原上取得了较大进展^[1]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文献不足征等原因，由建康城（今南京）内外居民的具体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历史图景，目前仍不清晰^[2]。如何将考古新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，深入描画六朝建康社会变迁的具像，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，也是近年来建康城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^[3]。在这方面，南京市江宁区出土刘宋罗健夫妇、罗道训买地券提供了一组崭新的资料群，弥足珍贵。由于这三方买地券学界尚未有深入研究，故本文拟以此为中心，围绕券文所提示的墓主人籍贯变迁、仕宦经历、葬地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，以此触及晋宋之际建康周边人群、社会的变动实态。

一、买地券的基本情况与录文

罗健夫妇买地券两方（下文简称 A 券、B 券），罗道训买地券一方（简称 C 券），现藏于南京江宁博物馆。2013 年，《东山掇芳：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》一书中刊布了券砖正面部分的照片，并提供了形制、出土地点等信息^[4]。尽管照片有若干处不甚清晰，但文字大体可读。为研究需要，现初步录文、标点如下：

1. 罗健夫妇买地券 I（A 券）

宋元嘉廿二年八月丁亥□十日丙申□。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钊阳县开国男罗健，□□□□里/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丘丞墓伯、地下两千石、东都丞、武夷王、□共买此地，□广五顷。□堂邑/郡□男女死人罗健夫妻，得钱万々九千九百九十九□钱，即日毕了。玄都鬼律、地下女青诏书□：/自军乱以来，普天死人听得随生人所□丹阳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中□□买

¹ 收稿日期：2017-04-26

作者简介：陆帅（1987—），男，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，主要研究方向：六朝史、历史地理学。
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魏晋南北朝墓志文献集成与综合研究”（17BZS129）、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项目“南朝侨流人口研究——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中心”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/地葬□，入□□此地中，掘作葬墓埋健夫妻尸丧，魂魄自得归此冢庐。随/地下死人之俗五腊及日月会十五日，休假上下，往来不得留难。有□问左/右，比居他人，妄仍夺取健地。时人张坚固、李定度，沽酒各半，共为券荊。

2. 罗健夫妇买地券 II (B 券)

宋元嘉廿二年太岁己酉八月丁亥□十日丙申□。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/钊阳县开国男罗健八十岁，妻□□八十岁。醉酒□□官归。□□玄都鬼律，地下/女青诏书科律：从军乱以来，普天下死人皆得随生人所在□□□□丹阳郡湖孰县□乡/西乡里中地下□、蒿里父老、□□□□□□丘丞墓伯、地下二千石、~/□尸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尸丧□□万々九千九百九十九枚，即日毕了。地下先人、□里□□□/□石□□□□□□丘丞墓伯、地下二千石、安都丞、武夷王、□（皆）听□□此地中，□□□□□□得使左右比居，妄志此地，□□不□。时知者张坚固、李定度，沽酒各半，共/为券荊。

3. 罗道训买地券 (C 券)

宋元嘉州年太岁癸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，予南/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地下先人、蒿里/父老、墓县右秩、左右冢候、丘丞墓伯、地下二千石、/安都丞、武夷王□□买此地，广一顷余。地/□□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，以义熙五年/六月三日庚申，诏书除袭父封钊阳县开/国男，食邑五百户，地□卅五里。到十二年四月十七/□□子，诏书除武原令。□□元嘉四年七月一日癸酉、/诏书除魏郡广川令。到六年六月廿一日辛巳、/诏书除南广平太守。到□年十月十九日丙申、/诏书除龙骧将军。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、诏/书除左卫殿中将军。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、诏书/除南平昌太守。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、诏书/除行参征北将军。事道训得钱万万九千九/百九十九枚，即日毕了。承玄都鬼律、地下/女青诏书科律：从军乱以来，普天下死人/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。今/皆于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丧，魂魄自/得还此冢庐，随地下死人科法。□即吉日，/月晦十五日□□上下往来，不得留难。有所□/□□□比居他人，妄仍夺取道训地。时知者/张坚固、李定度，沽酒各半，共为券荊。/右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此外据书中介绍，A、B 两券侧面亦有铭文。A 券为一行六字、B 券为一行二十四字。更为精确、完整的录文，尚有待相关部门公布清晰拓片。

三方买地券文内容丰富，涉及墓主籍贯、官职、爵位以及买地位置、时间等信息。A、B 券主人为罗健夫妇，其内容、形制相同。C 券主人为罗道训，其与 A、B 券在结构上的区别在于详细记录了墓主的仕宦履历，这在六朝买地券中不多见^[5]。

众所周知，买地券的主要功能是宣告亡者在阳间的生命结束，通过“买地”获得阴间的居留权，且往往与特定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，罗氏买地券也不例外。上述三份券文都提到了“玄都鬼律”与“地下女青诏书科律”。研究认为，其源自天师道信仰^[6]。东晋南朝时代，建康周边是天师道颇为流行的区域，罗氏买地券出土地东面不远的茅山更是南朝道教的中心所在，信仰氛围极其浓厚^[7]。罗氏买地券文中鲜明的天师道因素，正是这种信仰氛围的具体表现。

券文所反映信仰实态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买地者罗健、罗道训的情况，同样令人很感兴趣。具体而言，他们究竟来自何处？是何身份？又为何葬于建康周边？见于三方买地券的年代、职官、地理等信息，提供了不少线索。

二、罗氏父子的行迹

首先需要判定的是罗健、罗道训的关系。上述三方买地券出土于同一地点，墓主又为同姓，很容易将之联想为一个家族。事实上，券文中的爵位记载也证明了此点。

据券文，罗健、罗道训封爵都为钊阳县开国男^[8]。罗健葬于元嘉二十二年（445 年），受封时间不详，但肯定在此年以前。

罗道训亡于元嘉三十年（453 年），C 券记载其受封的时间与缘由曰：

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，诏书除口袭父封钊阳县开国男。

可知罗道训的爵位是东晋义熙五年（409 年）袭父封而来。此后至元嘉三十年下葬，其间并无改封。按中古爵制，一爵不能同时分封两人。若罗道训自义熙五年至元嘉三十年之间为钊阳县开国男，罗健便不可能在元嘉年间持有此爵位。这一矛盾，恰说明两者为父子关系：罗健为父，先封钊阳县，义熙五年时由于罗道训袭封。A、B 券爵位于罗健是对死者的尊称，与 C 券并不冲突。

罗道训于义熙五年袭封，罗健夫妇买地下葬却是在三十余年后的元嘉年间。这一时间差的产生原因，可以考虑两种可能。其一，罗健于义熙五年致仕，让爵于子罗道训，至元嘉二十二年去世，夫妻合葬^[9]。其二，罗健的亡故就在义熙五年，由于罗道训袭爵。翻检史传，是年四月刘裕伐南燕，于青齐合战多次，战事激烈^[10]。罗健作为刘裕旧部（说详下文）或于此时战死。由于卢循、徐道覆与此同时在南方起兵，进逼建康。故青齐战事甫定，刘裕随即班师。纷乱之际，罗健很可能就地草葬，灵柩未归。至元嘉二十二年，罗健夫人去世，其亲属重新择地，将两人正式合葬。

另可注意的是，券文所记罗氏父子的籍贯并不相同：A、B 券载罗健为堂邑郡高山县人，C 券载罗道训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人。梳理两晋南朝政区，堂邑郡高山县位于江北，东晋末已撤废，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，刘宋元嘉时尚存^[11]。则罗氏一族应是南渡过江的侨民，堂邑郡高山县是其本贯，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是南渡后所著籍贯，其南渡时间当不迟于东晋末^[12]。

永嘉乱后，南徐州彭城郡所在的京口周边，正是侨民在江南的一个聚居地^[13]。晋末、刘宋时代，南彭城郡的地位很特殊。一方面，它是宋武帝刘裕的乡里所在；另一方面，郡内侨民在代晋建宋的过程中也很活跃。《宋书》卷四九《刘钟传》载刘裕起兵京口之际，侨彭城郡民颇多“赴义者”。这些侨民被“立为义队”，“恒在左右，连战皆捷”，是刘裕极为信赖的一支力量^[14]。

著籍南彭城郡的罗氏父子，就是追随刘裕起事的旧部。史载，刘裕登基后随即下诏对前代爵位按例“降杀”——即减封、除国，但“宣力义熙，豫同艰难者”，则“一仍本秩，无所减降”^[15]。刘宋《谢琬墓志》载谢氏家族在晋宋禅代以后“诸国并皆削除”，即爵位“降杀”的实例^[16]。如前所述，自东晋至刘宋，罗氏父子爵等没有变化，正说明他们曾经参与了“造宋”大业。这一层渊源，也成为了罗氏父子进入刘宋政权的契机。券 C 所载罗道训的官职转迁情况，就是最为直接的体现。

如券 C 所见，罗道训的仕宦生涯长达三十余年。所任官职大致可分为郡县守令与武职两大类。其所守诸郡县中，魏郡广川县隶扬州，其余都属南徐州^[17]。扬州为京畿所在，南徐州是刘宋帝室的“桑梓故乡”，皆地位优重^[18]。罗道训在此两州频繁任职，是刘宋政权对罗氏参与佐命的回报，无需赘言。不过，这些郡县都是无实土侨郡县，事务清闲，近于寄禄之职。真正体现出其与当时政治密切联系的，是其于元嘉十七年（440 年）转任左卫殿中将军一事。

按《宋书》卷四〇《百官志·下》，殿中将军为皇帝近侍武官，“朝会宴飨，则将军戎服，直侍左右，夜开城诸门，则执白虎幡监之”，在宫城防务中地位关键^[19]。罗道训任此职是在是年十月，此时刘宋宫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变：权倾朝野的彭城王刘义康失势，刘湛等党羽伏诛。《宋书》卷六八《武二王·彭城王义康传》述其梗概云：

（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）其日刺（刘）义康入宿，留止中书省，其夕分收（刘）湛等，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，以备非常。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衅，义康上表逊位。^[20]

宫内防务例由禁军负责，宋文帝却在处分刘义康、刘湛等人时令“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，以备非常”，引入外军，这一细节值得玩味。翻检史传，自元嘉九年（432 年）至当年五月，统领禁军的领军将军一直由义康党羽刘湛所担任^[21]。宋文帝对

禁军不完全信任，正在于此。而刘湛伏诛后，引入心腹力量，重新控制禁防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。罗道训转任殿中将军恰在事件发生后四日。不久后，宋文帝又任命皇弟刘义融为领军将军^[22]。这些人事调整，皆可以置于此背景下理解。罗氏父子是早年的从龙旧部，与刘宋皇室渊源颇深，这或许是罗道训为宋文帝所信任的原因。

罗道训的死，同样与刘宋政治有关。券文记载，元嘉二十七年（450年）起，罗道训除征北行参军。检《宋书》纪传，时任府主的是始兴王刘浚^[23]。元嘉三十年二月，皇太子刘劭弑文帝即位，刘浚协成其事。此时罗道训的动向不详，但作为刘浚的僚属，难免被卷入其中。元嘉三十年五月，刘浚平定京邑，刘劭、刘浚及同党伏诛，罗道训则葬于是年七月。此后，罗氏家族的封国也被废除。综合这些来看，他很可能是作为“二凶”的同党而受到牵连^[24]。

堂邑罗氏名不见经传，史书中几乎无迹可寻。质言之，他们属于随刘宋政权而兴起的一批新贵。立足于这一背景，有助于对罗氏父子的墓葬位置作进一步的观察与认识。

三、都城圈与新居民

罗氏家族买地券出土于今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咸墅岗^[25]。但券文所记地望却不尽相同：A、B券皆记为丹杨郡湖熟（熟）县，之后作“西乡都乡里”与“□乡西乡里”不一。这类讹误在古代买地券中很常见。券C则云买地于“南徐州（南）彭城县都乡安上里”。

综合相关资料来看，罗氏父子葬地属于湖熟县西乡的可能性较大^[26]。当然，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墓葬所在的这片区域与都城建康的联系很紧密。这一点，通过墓葬西北、西南不远处的两个地点——倪塘与方山，就能够清晰地观察到。

倪塘在今江宁区上坊街道附近，关于这个地点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金陵记》云：

梁都之时，城中二十八万余户。西至石头城，东至倪塘，南至石子岗，北过蒋山，东西南北各四十里。^[27]

萧梁时代，倪塘是建康城东面的主要地标。不过其与建康的联系，远早于梁代。南齐柳世隆“于倪塘创墓”；晋末刘毅赴任荆州，路过建康，刘裕“出倪塘会之”；王恭为司马道子所拘，“于建康之倪塘斩之”，皆为其证^[28]。在上坊街道周边发现的大量高等级皇族、官僚墓葬与神道石刻，如孙吴上坊大墓、棱角山、沙石岗天册元年墓、石马冲东晋荀籍墓、中下村东晋南朝墓、耿岗、侯村、刘家边（梁萧正立）南朝神道石刻等，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倪塘是仕宦于建康的诸多官僚贵族活动、营葬的场所^[29]。

方山位于倪塘以南，即今江宁方山。其东侧有方山埭，是六朝时代连接秦淮水系与三吴水系的重要水道——破冈渚的起点，也是建康东面最重要的关津。作为交通枢纽，方山埭是商旅辐辏之地^[30]。都城中的贵族官僚，在此周边殖产营业者也为数不少。如刘宋何尚之致仕，“于方山著《退居赋》”；州韶“筑室湖熟之方山”；梁萧正德“自征虏亭至于方山，悉略为墅”^[31]。又《初学记》卷七《地理下》曰：

常熟有赤山湖、夏架湖、丹阳湖、张昭湖。昭封娄侯，又因名娄湖。高平湖、太傅湖。太傅即谢安也。著作簿湖、刘南蛮湖、侍中湖、张侯湖、葛塘湖、倪塘湖、庾冰湖……自娄已下，谓皆独擅一湖之利。^[32]

上引文字出自点校本。文首的“常熟”与赤山湖（今江苏句容赤山湖）、倪塘湖（今江宁上坊街道附近）等距离甚远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刻本《初学记》作“湖熟”，是。按引文所言，娄湖、太傅湖、庾冰湖、倪塘湖等“独擅一湖之利”的产业，遍布湖熟县境内。其主人如张昭、谢安、庾冰等，都是来自于建康的权贵官僚。六朝时代，权贵官僚热衷于以屯、邸、别墅等形式封山占泽^[33]。倪塘、方山所在的湖熟县密迹建康，自然颇受青睐，乃至东晋皇室在此亦有产业^[34]。

以方山、倪塘为代表，六朝建康城周边存在着一系列与之紧密关联的经济、生活区域，学界将之命名为“建康都城圈社会”^[35]。买地营葬于方山东侧的罗氏父子，当然也是都城圈社会的一员。这片区域对于罗氏家族的意义，在反复出现于三方买地券文中的一段文字中有所提示：

从军乱以来，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（邑）买地墓（埋）。

以上引自 C 券，A、B 券大体相近。如其所言，这里不仅是罗氏父子“买地墓埋”之所，也是其家族的“生人所在”，也就是实际居住地。文中提到的“军乱”，指东晋末年的孙恩、卢循之乱^[36]。由此还可推知，罗氏生居、死葬于此是在东晋末以后。若不是这样，也就没必要特意写上这番话了。

罗氏家族迁居建康周边的动因不难索解。前面说到，凭借代晋建宋的功勋，罗健、罗道训活跃在晋末、刘宋政治中。尤其是罗道训，元嘉年间两次任职京邑，其为双亲营葬的元嘉二十二年，更已在建康宫中达五年之久。可以想象，仕宦生涯的中央化，使得建康成为罗氏家族的生活重心所在，他们也因此东南不远的湖熟县购地置业，成为了都城圈中的新居民。

那么，罗氏家族在新居地的生活如何？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，罗氏父子先后下葬的元嘉年间，淮水两岸仍为刘宋所控制，原高山县地仍在版图内。显然，定居日久的他们已不打算回去了。从这一角度理解买地券中的“死人听随生人所在买地墓埋”这句话，其表现出的也就不仅是侨民异地埋葬的无奈，更是他们对于江南新居地、对于建康社会的实际认同。六朝江南侨、旧民之间的融合，也正是以这种心理认同为基础而不断展开的。

四、结语

晋宋之际，随着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，建康的居住人群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。罗氏父子的活动，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在当时，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，如彭城刘氏、东莞臧氏、高平檀氏、下邳赵氏、兰陵萧氏等。借助于王朝易代所提供的上升渠道，这些原本侨居京口、晋陵的侨民家族成为一时新贵，不断向都城建康及其周边集中。由此来看高平檀道济、兰陵萧思话、萧道成家族移居“建康青溪”^[37]，萧衍家族移居“秣陵县同夏里”^[38]，彭城刘袭家族在位于建康北郊的“江乘白山”、“琅琊乘武冈”择地营葬等史实^[39]，对其所透射出的历史内涵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罗氏家族买地券对于理解六朝建康社会发展脉络所具有的个案意义，也正在此处。

其实，类似的人群流动，在此后仍不断发生。南北方的政治、社会变动，往往都伴随着各色人群对建康周边的进入。宋齐之际“青齐士民”的南下，萧梁时代从中原南奔而来北魏皇族、士人等等，都是如此。新居民的到来，不仅改变了建康社会的人群结构，还带来了自身所固有的生计习俗、信仰传统，构成了更为多元的社会文化图景。这种图景，也就是《隋书》卷三一《地理志·下》所概括的“（建康）人杂五方，其俗（与二京）颇相类”^[40]。那么，不断进入的新居民是如何与建康社会展开互动的？他们给建康的城市景观、文化样貌带来了哪些影响？以这些问题意识为参照，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将会变得更加有趣。

（附记：本文写作期间，承蒙张学锋、王志高、姚乐、许志强、刘萃峰等师友惠赐诸多宝贵意见，谨此一并致谢。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 a. 张学锋：《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》，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2期；b.（日）中村圭尔：《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》，东京：汲古书院2006年，第453—553页；c. 杨国庆、王志高：《南京城墙志》，凤凰出版社2008年，第11—97页；d. 陈刚：《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。

[2] 卢海鸣：《六朝都城建康研究状况综述》，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1期。

[3] a. 张学锋：《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——以破冈渚的探讨为中心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32辑，2015年，第63—83页；b. 魏斌：《南朝建康的东郊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16年第3期；c.〔日〕小尾孝夫撰，陆帅译：《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与江右地区》，《中国中古史集刊》第2辑，商务印书馆2016年，第40—57页。

[4] 江宁博物馆、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编：《东山掇芳：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，第14—15页。

[5] 鲁西奇：《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，第121页。

[6] 刘安志：《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》，《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，第65—86页。

[7] a. 刘屹：《晋宋“奉道世家”研究》，《天问》（丁亥卷）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，第213—240页；b. 魏斌：《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4年第3期。

[8] 钊阳县于史无载，刘宋时长沙国下有浏阳侯国（县），亦作刘阳。“刘”、“钊”字型相近，古代常异写。承蒙南京大学聂澹萌老师告知，《晋书》中便颇有其例，如卷八七《凉武昭王传》“非刘孙之鸿度”一句，南图本、池州本等作“刘”，宋杨氏海源阁本作“钊”。浏阳侯国的记载，见南朝梁·沈约：《宋书》卷三七《州郡志·三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，第1129页。

[9] 南北朝时代生前让爵的例子，如北魏大臣源贺“辞老”，让爵于其子源思礼，见北朝齐·魏收：《魏书》卷四一《源贺传附源思礼传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，第923页。

[10] 《宋书》卷一《武帝纪·上》，第15—16页。

[11] 堂邑、高山原均为县，西晋武帝时属临淮郡。晋惠帝永兴元年（304年），立堂邑郡，治堂邑县。此时高山县所属不详，不过两县相互毗邻，属堂邑郡的可能性很大。东晋在江南又侨设过堂邑郡，但仅领堂邑一县。因此该行政区划必然位于江北。彭城郡原在江北，后侨置属南徐州，在江南。堂邑郡见《宋书》卷三五《州郡志·一》，第1029页；《晋书》卷一五《地理志·下》，第451—452页。南彭城郡的情况见胡阿祥：《〈宋书·州郡志〉汇释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，第34—35页。

[12] 位于江北的堂邑郡东晋末被改为秦郡，侨设于江南的堂邑郡则于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时被省并。罗健下葬之际，堂邑郡不存在于当时的行政区划中，故只能是其南渡前的原籍。南徐州（南）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，元嘉时代尚存，其应是罗氏南渡后的著籍郡县。南彭城郡彭城县虽不见于《宋书》卷三五《州郡志·一》，但如点校本第21条校勘记（第1066页）引孙彪《宋书考论》之说，《州郡志》记南彭城郡辖县十二，县名却仅有十一，所缺当即为彭城县。

[13] a. 胡阿祥：《〈宋书·州郡志〉汇释》，第34—35页；b. 田余庆：《北府兵始末》，《秦汉魏晋史探微（重订本）》，第330—378页。另需指出的是，刘宋永初元年（420年），诏令位于南方的侨州郡县均加“南”字。故C券所谓彭城郡，当作南彭城郡。参见《宋书》卷三《武帝纪·下》，第55页。

[14] 《宋书》卷四九《刘钟传》，第1438页。

[15] 《宋书》卷三《武帝纪·下》，第53页。

[16] 张学锋：《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——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》，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》2004年第3期。

[17] 胡阿祥：《〈宋书·州郡志〉汇释》，第24—42、144—153页。需要稍作解释的是魏郡广川县。该县刘宋时冀州、扬州均有设置，但属冀州者元嘉九年始置，故罗道训元嘉四年所任广川令当属扬州。

[18] a. 同[15] b; b. (日) 中村圭尔：《南朝政權と南徐州社会》，《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》，第124—158页；c. (日) 小尾孝夫：《南朝宋齐時代の国軍体制と僑州南徐州》，《唐代史研究》第13号，2010年，第3—32页。

[19] 《宋书》卷四〇《百官志·下》，第1249—1250页。

[20] 《宋书》卷六八《武二王·彭城王义康传》，第1792页。

[21] 张金龙：《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5年第1期。

[22] 是月丙辰朔，刘义康事变发生于戊午（三日），C券载罗道训任职于七日；刘义融的任职时间，见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，第87页。

[23] 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，第98页。

[24] 《宋书》卷三七《州郡志·三》长沙国下有“浏阳侯相”，而非“浏阳男相”。如沈约在《州郡志》序中所言，这是刘宋大明八年的行政区划。“浏阳”即“钊阳”，同[8]；又《宋书》卷九一《孝义传·卜天兴》（第2253页）、卷九九《二凶传》（第2434页）均提及当时刘劭麾下“旧将”、“军主”罗训，与罗道训身份相类。若再考虑到六朝人名中“道”、“之”、“灵”等皆为虚字，常略写，此罗训或就是罗道训。“二凶”事件中，刘浚是刘劭的主要支持者，其僚属罗道训为刘劭所用很正常。

[25] 同[4]，第14—15页。

[26] 汉六朝湖熟县均治今江宁区湖熟镇。1989年，湖熟镇东北东汉墓葬中曾出土木牍一方，上有“丹杨郡湖熟（熟）都乡”等字，罗氏买地券出土于湖熟镇西北8公里处，似属西乡。至于C券云买地于“南徐州（南）彭城郡彭城县”，恐非现实。因为宋、齐时代，南彭城郡均为寄治京口的无实土侨郡。既无实土，也就不存在买地的实体空间，此地点应是葬者观念中的籍贯。木牍见南京市博物馆、江宁县文化局：《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》，《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，第3—15页。南彭城郡无实土的记载，见南朝梁·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卷一四《州郡志·上》，中华书局1972年，第246—248页。

[27] 宋·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〇《江东南道二·升州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，第1774页。

[28] 《南齐书》卷二四《柳世隆传》，第453页；《宋书》卷五〇《胡藩传》，第1444页；《晋书》卷八四《王恭传》，第2186页。

[29] a. 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：《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》，《东南文化》2009年第3期；b.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、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：《南京江宁上坊中下村五座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》，《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（第四辑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6年，第78—88页。石马冲荀籍墓见[4]，第6、13、110、163页。上坊周边神道石刻见徐湖平：《南朝陵墓雕刻艺术》，文物出版社2006年，第213—225、259—266、281—282页。

[30] 同[3] a。

[31] 《宋书》卷六六《何尚之传》、卷九三《隐逸传·州韶》，第 1736、2296 页；唐·李延寿：《南史》卷五一《梁宗室传上·萧正德》，第 1281 页。

[32] 唐·徐坚：《初学记》卷七《地理下》，中华书局 2004 年，第 140 页。

[33] 唐长孺：《南朝的屯、邸、别墅及山泽占领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54 年第 3 期。

[34] 《晋书》卷一〇《安帝纪》载：“（义熙九年）夏四月壬戌，罢临沂、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”（第 264 页），可证。

[35] 同 [3] a。

[36] 刘昭瑞：《妳女买地券与早期道教的南传》，《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 2007 年，第 320—335 页。

[37] 高平檀氏见《宋书》卷四三《檀道济传》、卷四五《檀韶传》，第 1341、1372 页；宋·李昉：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二四《檀道济》，中华书局 1961 年，第 2571 页。兰陵萧氏见《宋书》卷八七《萧惠开传》，第 2200 页；《南齐书》卷一《高帝纪》、卷三《武帝纪》，第 1、43 页；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三五《宋明帝》，第 967—968 页。

[38] 唐·姚思廉：《梁书》卷一《武帝纪》，第 1 页。

[39] 邵磊：《刘宋临澧忠侯〈刘袭墓志〉疏证》，《治山存稿》，凤凰出版社 2004 年，第 138—150 页。

[40] 二京即长安、洛阳。《隋书》述其风俗云：“京兆王都所在，俗具五方，人物混淆，华戎杂错”，则建康风俗亦大致如此。唐·魏征：《隋书》卷二九《地理志·上》、卷三一《地理志·下》，中华书局 1973 年，第 817、887 页。